

四川省地方志资料丛书

四川近现代人物传

第二辑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省志人物志编辑编

任一民 主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四川省地方志资料丛书

四川近现代人物传

第二辑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省志人物志编辑组编
任 一 民 主 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六·七·成都

责任编辑：吴康零

封面设计：唐传东

四川近现代人物传 第二辑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省志人物志编辑组编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峨影厂印刷所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250千
1986年7月第一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书号：11316.48

定价：1.80元

前 言

《四川近现代人物传》是四川省地方志资料丛书之一，它的出版，除为了满足史志工作者和爱好者的需要外，也是为了广泛征求意见，为今后正式编纂四川省志《人物志》作好准备。《四川近现代人物传》收录自1840年至1986年间，籍隶四川，有一定影响或显著贡献的已故的各方面人物，客籍人物如对四川有重大影响，也在收录之列。该书计划收录的人物约一千个，分辑在近几年内陆续出版。

编写《四川近现代人物传》，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人可以立传，什么人不能立传，立传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史学界争议较少，而在方志学界则众说纷纭，颇不一致。我们认为，地方志的人物传和地方史的人物传，都是为历史人物立传，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旧的史和志的人物传之所以有区别，主要是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作了如下的分工：史书的人物传，主要写帝王将相，目的是“存史”和“资政”；志书的人物传，主要写地方上的道德楷模，并陪衬一点德行丑恶的人物，目的是“彰善癉恶”，“教化”人民。新的史和志的人物传，当然不能沿袭这种旧的模式，而应该让志书的人物传，除教育作用外，同样具有“存史”和“资政”的作用，同样是写历史人物。既然为历史人物立传，那我们选择人物，就只能以这个人物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影响、功过以及贡献为立传标准，而不能以其他的，诸如道德、地位、职务、职业等等为立传标准。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把本书的立传标准概括如下：凡曾推动或阻碍社会进步，对四川省有过一定影响或显著贡献的已故的各方面人物，均可入传。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地全面地反映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K78/27

我们不以道德为立传标准，因为道德既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也不能说明一个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道德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我们重视人物传的教育作用，但不能把地方志的人物传仅仅看成是表彰革命英雄、爱国志士以及先进模范人物的教本。这样做，实际上是缩减了地方志人物传的教育内容。因为地方志的人物传包括了各个方面的历史人物，这样的人物传，合起来就是一部传记体的地方通史，其教育内容，当然要比单写楷模人物的人物传，丰富得多。

我们选择人物，不以地位、职务为立传标准。地位高，职务大，可以作为考虑对象，但是否立传，主要看这个人物对社会历史的作用、影响以及贡献的大小。我们反对英雄史观，因此立传人物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都在立传之列。但又必须承认个别人物的历史作用，选择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出类拔萃的人物，突出冒尖的人物，关键是在四川省有一定影响或显著贡献的人物。地方志应该发掘人物，但也只是发掘那些确有贡献而被湮没的人物。

该书的人物排列，不以姓氏笔划为序，也不按传主的卒年顺序排列，更不在政治上进行归类，而是按照军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和少数民族分类编入，没有什么严格的顺序标准。

我们编写《四川近现代人物传》，工作仅仅是开始，一切尚在摸索，由于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参加第二辑编辑工作的，有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人物志编辑组的吴嘉陵、孙晓芬、官振维、赵桂芳同志。此外，本书在编纂过程中，还得到金汇海、李有明、肖宗第、乔毅民、周锡银等同志的大力帮助，谨此致谢。

任 一 民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目 录

肖楚女	邓寿明	(1)
孙炳文	罗 歌	(7)
刘伯坚	陈永久	(13)
陆更夫	陆 能 金汇海	(17)
冉 钧	王 斌	(21)
袁诗嘉	王寿熙	(26)
黎澹英	王东伟	(32)
王维舟	温贤美	(37)
陈 刚	金 铠	(43)

李永和	李有明	(46)
彭家珍	张诚毅 徐南洲	(51)
龙鸣剑	曾绍敏	(56)
黄 方	许宝康	(62)
余 英	何一民	(66)
董修武	王 笛	(71)
赵铁桥	许宝康	(76)
黄复生	何一民	(81)
杨庶堪	马宣伟	(85)
蒲殿俊	林 顿 何一立	(91)
尹昌衡	邱远应	(97)
骆成骧	官振维	(101)
夏之时	何一立	(106)
王铭章	张燮明	(112)

谢 持	苏铁生 (118)
骆秉章	谢 放 (123)
锡 良	王 笛 (128)
陈 宦	何一立 (134)
徐 堪	马宣伟 (140)
唐式遵	吴嘉陵 (147)

杨 粲三	朱 苏 (153)
肖则可	赵桂芳 (159)
陈开沚	余 涛 (164)
李四友堂 (家族合传)	张学君 (168)
刘继陶、刘象曦 (合传)	张钧陶 (174)
黄锡滋、黄明安 (合传)	张钧陶 (180)
宋育仁	徐 溥 (185)
张森楷	张学君 (191)
陈豹隐	常裕如 (196)
刘绍禹	古 直 (201)
冯汉骥	童恩正 (206)
张怡荪	黄显铭 (212)
徐近之	张义富 何厚雪 刘 明 (218)
曾 懿	陈先赋 (224)
蒲辅周	陈先赋 (228)
黄济川	蓝太富 (233)
李兴隆	刘鹏先 (237)

张大千	李永翘 (241)
何其芳	尹在勤 曹礼尧 (247)
陈翔鹤	洪 钟 (251)
刘盛亚	金汇海 (255)
吴芳吉	金国永 (261)

罗 淑	李定舟 (267)
陈彦衡 (附陈富年)	孙晓芬 (272)
天 籁	罗湘浦 (278)
李德才	车 辐 (283)
向志均	孙仲达 (288)
黄敬临	廖上柯 (291)
果基小约旦	周锡银 (296)
何廷禄	李汝能 (300)
王恩洋	贾题韬 (305)
昌 圆	田继章 (310)
易心莹	余孝恒 (314)

肖楚女

邓寿明

肖楚女，原名肖树烈，又名肖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1922年下半年到1924年8月，曾两度入川，为四川中共党团组织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肖楚女于1891年出生在湖北省汉阳县鹦鹉洲的一个小商家庭。辛亥革命前夕，肖楚女参加武汉新军，接触到一些革命党人，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投身于革命。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他奋不顾身地参加战斗，被炮声震聋了一只耳朵。辛亥革命后，他退出新军考入了武昌新民实业学校。毕业后，他放弃了所学专业而积极为一些报社写稿。评论时政，探索改造社会的途径。1915年，湖北天门人刘泥清创办《崇德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反对帝制复辟，聘请肖楚女任主笔，同时肖还兼《大汉日报》的编辑。五四运动后，肖楚女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成为该社的骨干。1921年秋，肖楚女应恽代英之邀到安徽省宣城县第四师范任教。他协助恽代英工作，使该校的教育工作颇著成效。不久，恽代英前往四川泸县川南师范执教。1922年8月，肖楚女因传播进步思想横遭封建势力攻击而由宣城返回武汉。这时适遇恽代英出川到上海为学校采购图书、教学仪器路过武汉。经恽代英和林育南介绍，肖楚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嗣后，恽代英又介绍肖楚女前往四川泸县川南师范任教，到达泸县不久，因川南政局变化，改赴重庆联合中学任国文教员。此时，四川的学生择师运动蔓延全川，重庆、成都、泸县尤为激烈。四川军阀采取高压手段，开除进步教师和敢于反抗的学生，在重庆先后把联合中学、巴县中学、川东师范等进步校长撤职。面对反动派的高压，肖楚女和王

仲宣等联络一批进步教师，发表了抗议军阀压迫的离职宣言，揭露军阀与反动政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罪行。

为了解决失业失学青年的读书问题，肖楚女与熊禹治等人于1922年11月开办了以“选士育才”为宗旨的“重庆公学”，①校址设在重庆半边街铁道银行旧址，参加学习的学生有一百多人。公学的经费靠募捐，学生免费入学，教师们不拿薪俸，学校实行民主管理。由于重庆公学不依靠任何政客军人势力，驻重庆的川东道尹徐孝刚视公学为洪水猛兽，不许公学立案。肖楚女受重庆公学同人委托，草拟呈文向道署申请立案，并代表公学致函四川当局进行申诉。重庆当局不顾群众反对，于12月29日下令解散重庆公学。肖楚女将封闭、解散公学的布告作为“最后一课”的内容，向学生进行宣读和分析，鼓励学生转入农村去开展农村教育，寻找新的道路。

重庆公学被解散以后，肖楚女于1923年初应刘明扬邀请到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在教授国文时，他选用《离骚》、《封建论》等，以及“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为教材，还组织读书会，指导学生阅读进步刊物，发动学生抵制日货，并和国家主义派进行坚决斗争。他还秘密在万县师范学校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②为发展万县的革命运动播下了种子。这时，驻鄂川军杨森在吴佩孚的接济下，打着“拯救全川父老兄弟姐妹”的旗号，由鄂回川，在川东和熊克武展开了争夺地盘战争。杨森闻肖楚女才华出众，要聘他任秘书。肖楚女利用这一机会开展活动，为杨森撰写了一篇《杨森对川人的宣言》，社会舆论称赞它“胜过百万甲兵。”③杨森得胜后，违背宣言诺言，肖楚女愤而辞去兼任的秘书职务。

1923年夏天，肖楚女从万县到重庆，在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深得校长蒙成裁的器重。蒙又介绍他与《新蜀报》的经理宋南轩相识。宋立即聘肖兼任《新蜀报》主笔，负责该报社论和时评，并辟设“社会青年问题”、“社会黑幕”专

栏。在“社会青年问题”专栏中，肖楚女针对青年们在读书、就业、婚姻、家庭等问题上存在的各种思想，用问题解答，评述等形式进行引导。在“社会黑幕”④专栏中，肖楚女不仅揭露了封建统治下的罪恶，还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些罪恶的社会根源。肖楚女到《新蜀报》后，该报的革命观点日益明确，喊出了人民的呼声，受到人民的欢迎。因此，该报的发行量巨增，成为当时四川最有影响的报纸。

1924年1月，肖楚女因慈母病重乘坐江巴轮离渝回汉。母亲逝世之后，他转赴湖北襄阳县立第二师范任教。5月，他又从襄阳回到武汉。这时，肖楚女已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委员，他受团中央委托，到江苏省吴江县、松江县和江阴县等地检查团的工作。5月18日，肖楚女到了上海，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还积极为《响导》、《新建设》、《学生杂志》、《教育与人生周刊》、《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撰稿。他在沪五个月，先后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

肖楚女离开重庆以后，许多革命师生和《新蜀报》的同人都十分想念他，多次写信催他回渝工作。重庆团地委的负责人童庸生、薪斧（何星辅）也联名写信给团中央，建议肖楚女到川工作。⑤经组织同意，肖楚女决定应聘任《新蜀报》主笔，并在重庆女二师任教。

1924年8月初，肖楚女抵重庆。为工作便利起见，他在《新蜀报》社附近租赁了一间房子居住，并经常在这里举行会议和接见群众。团中央为了加强对四川团组织的领导，1924年9月1日，委任肖楚女为团中央特派员，负责领导成都、泸州、重庆三地的团组织。

为了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1924年秋，肖楚女和童庸生等发起组织了以研究社会科学为宗旨的“四川平民学社”。参加学社的有工厂、商店、学校的男女青年三百余人，尤以川东师范、重庆女二师的最多。学社出版了《曙光》杂志，肖楚女常为

此刊撰文。学社还创办了三所平民学校，设立了青年劳动部。同时，肖楚女又组织了“学行励进会”。

“四川平民学社”和“学行励进会”常在张家花园、南岸等僻静的地方举行讲演会、谈话会和读书会，讨论当前的形势和青年的任务。肖楚女给青年们讲马克思“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学说，还用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事例和经验教训来教育工人。在群众运动中，肖楚女及时吸收了其中符合条件的人参加青年团组织。对于重庆前团组织负责人唐某，出于私心对肖楚女的要挟、攻击和在工作上带来的困难，肖楚女向团中央提出报告，取得同意后，采取了妥善的办法解决。经过整顿，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委员会。同时，还将团员中的优秀分子转党，于次年初成立了重庆地方党的基层组织。

1924年11月，日商轮“德阳丸”号无视重庆当局的禁令，包庇奸商偷运劣币到重庆，还指使船员将警察处派去的谍查员四人推下江中，并打伤有关人员，引起各界群众的无比愤慨。事情发生后，在重庆团组织的领导下，各界群众组织了“重庆外交后援会。”重庆当局唯恐事态扩大，派军警督察处召集各团体代表会议。肖楚女代表《新蜀报》参加会议，提出两项主张：一、对于肇事的日人及奸商，以及媚外的渝关监督，要严惩不贷；二、进一步调查核实被推下江中的谍查员是否被淹死，再论赔偿问题。⑥

由于当局和日领事拖延解决“德阳丸”案，重庆团组织决定联络各界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帝群众运动。12月13日，江北、巴县、重庆各界群众六十四个团体共数千人，在打枪坝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集会。肖楚女代表《新蜀报》赴会讲演，并领导群众把破坏会场的国家主义分子赶出会场。会后，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向政府当局请愿，迫使当局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德阳丸”事件遂以人民的胜利而结束。

这时，国家主义派头子曾琦（四川人）在上海出版了《醒

《醒狮》周刊，为了在四川发展国家主义分子，扩大其影响，特将每期《醒狮》邮寄十份给重庆女二师。同学们对国家主义既厌恶又不了解，肖楚女及时给予理论上的指导，帮助她们认识国家主义派的理论对国家前途的危害。这一行为遭到国家主义分子的仇恨，他们勾结反动政客、文痞，在报纸上发表许多文章，宣扬国家主义，攻击《新蜀报》，谩骂肖楚女。肖楚女撰写了许多文章，驳斥其谬论，并引导各校进步师生举行国家主义问题讨论会，帮助他们认清国家主义的反动实质，使许多国家主义分子在重庆教育界无法立足。肖楚女为批判《醒狮》的谬论，肃清其影响，特编辑了一本名为《肃清》的刊物在群众中散发。

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为支持孙中山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指示各地党团组织支持孙中山的北上行动，并选举代表赴京参加会议。肖楚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国民党右派、军阀、官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选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十三人赴北京参加全国国民会议。在欢送大会上，肖楚女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致词，勉励代表要不怕艰险，敢于同军阀作斗争。⑦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噩耗传至重庆，肖楚女立即为《新蜀报》撰写了沉痛悼念孙中山的社论，并参加领导重庆各群众团体举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

肖楚女在四川的革命活动，使军阀、官僚深感痛恨。重庆反动当局曾三次胁迫肖楚女离川，甚至欲动用武力。为了安全，杨闇公请肖楚女到他家暂住。⑧这时，四川团组织的整顿和党组织的发展已取得不少成绩，中共四川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已大体筹备就绪，肖楚女将自己所负责的工作移交给了杨闇公。1925年1月，肖楚女离开重庆，乘船东下去上海。这年秋，中共重庆地委（省级组织）初步建立，次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

1927年4月15日，肖楚女在广州的反革命政变中被敌人逮捕，同月22日，英勇不屈地牺牲于南石头监狱，时年三十六岁。

注：

- ①杨效春：《重庆公学始末记》，1923年《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
- ②杜之祥：《肖楚女战斗在万县省四师》，《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6期。
- ③《杨森对川人的宣言》，《国民公报》1923年4月9、10、11日。
- ④贺植书：《四千号的追忆》，1934年5月《新蜀报、四千号纪念特刊》。
- ⑤新斧、庸生1924年7月25日给中央（团中央）的信。
- ⑥《国民公报》1924年12月4日。
- ⑦郝谦：《肖楚女同志在四川的建党活动》，《四川革命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
- ⑧《杨蓍公日记》第26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孙 炳 文

罗 歌

孙炳文，字浚明，四川南溪人，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生。祖籍湖北麻城，在“湖广填四川”时迁居于此。世代务农，至父辈时始经商，父名步蟾，有子女十一人，炳文居九。

孙炳文自幼聪明，秉性敦厚。八岁入私塾读书。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去叙府（今宜宾市），考入叙府中学。因其父去世，家人分居，他上学的费用由八哥孙炳章供给。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孙炳文进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预科一类英文一班。他在大学读书时，谦逊好学，成绩优秀，名列前茅。当时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民主革命思想日益广泛传播，从而加速孙炳文的觉醒。不久，孙炳文加入中国同盟会，思想更为激进，充满着革命的热情与奋斗的精神。1911年（宣统三年）初，他在考卷中讽刺学堂当局，当即被挂牌开除，后转入保定高等学堂插班就读。同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被推举为京津同盟会文事部部长，一切宣言文件，来往函电，莫不出诸炳文之手。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严复任校长。他到职后，下令将被开除的学生孙炳文等都找回来。同年10月，孙炳文在北京大学预科一类英文一班毕业。

孙炳文在北大毕业后，任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他常在报上撰文痛斥袁世凯的篡国罪行，并同当时拥袁的进步党的报纸展开论战。他对进步党拥护袁世凯独裁专制的反动言行十分痛恨。一次，孙炳文到该社辩论，辩到最激烈的时候，他气愤极了，用拳头将一个穿衣镜捶破，回来时两手鲜血淋漓。他平时为人温文有礼，但在对敌斗争中，却毫不留情。

1913年春，孙炳文与任锐^①在北京结婚。不久，因反动势力日益猖獗，无法栖身，他们只好回到家乡南溪。回乡后，孙炳文曾创办南溪平民夜课学校，传播革命思想。他亲自编辑教材，内容通俗易懂，深受学生欢迎。

1914年，他俩同赴成都，先后在成都省垣叙属联合中学、遂宁师范学校任教，培植革命后代，但经常领不到薪金，生活清苦，有时甚至断炊。

1917年春天，孙炳文经好友李贞白和八哥孙炳章介绍，在泸州和朱德^②见面。朱德的举止言谈吸引着孙炳文。朱德朴实、谦逊、豁达的品德和作风给予孙炳文极好的印象。后来，朱德了解到孙炳文的思想进步，学识渊博，深通历史、文学、哲学，诗文也写得好。便多次去信邀请孙炳文来朱德旅部任职。1918年1月，孙炳文到达泸州，任靖国第二军十三旅旅部谘谋。从此，孙炳文和朱德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结为挚友，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

革命不成功，志士苦徬徨。由于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都陷入了苦闷和彷徨之中。1919年在河南开封出版的《心声》杂志第1期上，载有孙炳文撰写的旧体诗《行路难》。这首诗反映了作者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也反映了诗人在求索中的矛盾。作者写着：“嗟吁乎，吾欲登昆仑而望远海兮，岂有贼能阻！吾欲倚长剑天外兮，孰不我许！行路难兮，满地穿墉之雀、宿讼之鼠。吾不难不顾而去兮，云帔轩举。哀无辜之民兮，无宁处。行路难兮，大好河山，四亿同仇，吾难舍汝。”“行行重行行，莫更伤路难，青天一挥手，已在层云端。男儿报国耳，莫取孤箠弹。圣人邈天际，君看披心肝。”此诗以直冲云霄的气势，倾泻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恋和忧虑，对“不义而富且贵”的鄙视，对寻求光明和真理的执着，在彷徨和求索中发出大气磅礴的誓言和感人肺腑的奇气。

孙炳文和朱德经过长时间的探讨，认为只靠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达不到革命的目的，必须从头进行革命。他们又一起阅读从北京寄来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读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认识到要从头进行革命，就必须学习俄国新式的革命理论和方法。

1920年，孙炳文离开滇军，到成都任四川造币厂厂长。时值川、滇、黔三省军阀之间大混战，川军战败。川军总司令吕超命令：“全部提取造币厂存款，如不遵从，即行枪决。”孙炳文仅交出存款半数，将余款封存，并及时发出快邮代电，痛斥川滇军：“军阀混战，徒苦小民。……”他力主保护民众，废除苛捐杂税。离厂时，两袖清风，一文不苟。同年年底，几经反复的三省军阀大混战结束，滇、黔军最后溃败。滇军决定回师讨伐唐继尧。孙炳文与朱德约定，孙炳文先去北京，朱德暂回云南，在打倒唐继尧之后，马上离开滇军，到北京去与孙炳文会合，然后到国外去研究先进的政治思想和制度。

1921年，孙炳文全家离四川去北京。次年夏天，朱德也从云南经重庆、上海、到达北京。两人会合后，他们决心找党。后来打听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孙中山也从广州回到了上海，于是，他们立即去上海，拜见孙中山和陈独秀。

1922年9月，孙炳文与朱德按原订计划，远航西欧，到德国去寻求真理。他们乘法国邮船“安得列朋”号离开上海，于10月中旬安抵法国马赛，旋即乘车去巴黎。他们在巴黎华侨协社——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主要集合地，得知最近刚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周恩来是负责人之一。他们兴冲冲地去拜见周恩来，但未见到，此时周恩来正在柏林。于是，他们于10月下旬赶赴柏林，找到了周恩来。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周恩来从这两位年长的客人身上，了解到他们自辛亥革命以来所经历的艰苦的思想转变历程。他们顽强地求索真理、寻求新的革命道路的决心，深深地感动了周恩来。因此，当孙炳文和朱德提出入党要求时，周恩来立